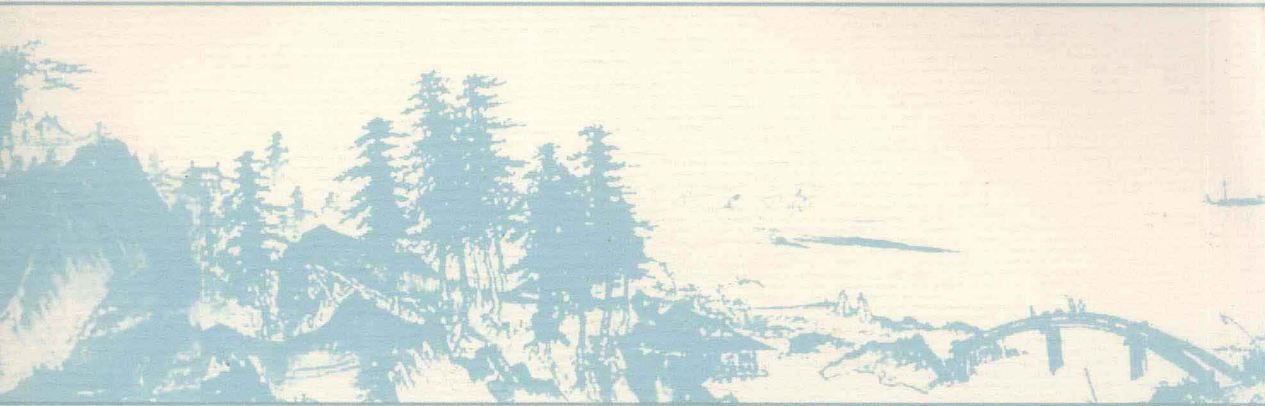


【中国散文研究】




中国古代散文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福建师范大学中国散文研究中心

主编 陈庆元 副主编 欧明俊

 凤凰出版社

【中国散文研究】

中国古代散文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福建师范大学中国散文研究中心 主编 陈庆元 副主编 欧明俊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散文研究：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陈庆元主编.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506-1085-9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古典散文—古典文学研究—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I207.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6541号

- 书 名 中国散文研究——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陈庆元
责任编辑 樊 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浦口大桥北路京新村546号,邮编:210031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47
字 数 1114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085-9
定 价 11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58849828)

前 言

为推动海内外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进一步繁荣,由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福建省文学学会和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的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8月27日至29日在福建武夷山举行。

古代散文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可喜可贺。我本人认为中国散文研究,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领域,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散文文体学的建构与研究。当前,中国文体学研究仍然采用西方的“四分法”,散文是并列于小说、戏剧、诗歌的一种文体。但是,由于汉字书写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文学传统的源远流长和丰富性,“四分法”似不能完整地反映出中国文学的全部风貌,例如“赋”这一在汉魏六朝很风行的文体(北朝人甚至还有不会作赋不能算是文学家之说),句式整齐,押韵,如果按照当下文体论的概念,似乎更加接近诗类,然而,当代任何一部古代诗歌的选本,我们见不到“赋”的踪迹,而在古代散文的选本中,却不时有它的身影。我们再翻翻《昭明文选》,这部现存的古代第一部文学总集,昭明太子按文体把它分成近四十类。除了诗、骚之外,其他文体似乎都是“散文”。但是,同样都是散文,三十多类的划分,绝不是萧统的“无事生非”、“无事找事”,据李善所注,每一种文体都由来有自,都有它的根据。研究《昭明文选》除了诗、骚之外的文体,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散文文体研究的一项内容。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昭明文选》文体的研究已经出现许多很好的研究成果;我们很高兴,汉魏六朝文体学的研究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成果,中山大学何诗海博士的新著《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就很有代表性。

相对于古代散文的文体研究,现当代散文的文体研究可能比较薄弱。现当代散文的文体相当丰富,有些文体“古已有之”,如游记体散文、传记体散文、序跋体散文。今人书序体的散文,多数是用白话文写的,我们注意到了陈允吉先生主编的《佛教文学精粹》(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和《佛教文学粹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两部书的序,这两篇序也是陈先生所撰,两篇序都是用骈文写就。陈先生这两篇序都写得很有文彩,是难得的美文。这两篇序也许是当代书序的特例,但研究当代的书序却不能对它置之于研究视野之外。当代有些文体则是对古代文体的改造,如古代称寿序,今人叫祝寿辞;有些文体是古代所无,今天却很流行,如开幕辞、闭幕辞。寿辞或开幕辞、闭幕辞,很多是不带文学色彩的,暂且不论,但是有些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的,散文研究者要不要加以关注?散文各种文体,都有各自的文体特点或特色,这是我们今天很需要研究的。

其次,散文研究专家,也应当有散文写作的实践。我们常说研究古代诗词的学者,自己必须有诗词的写作实践,这样,诗词研究可能会更有深度。我们同样要说,研究散文的专家,也必须有散文写作的实践,以避免研究的隔膜。古人许多书序、集序、诗序写得很有文彩,例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毫无疑问,是千古名篇。现在,我们许多专家为友朋、学生作序,千

篇一律，一篇篇序像是一篇篇的论说文，像是一篇篇的读后感。散文研究专家如果自己多一点散文写作的实践，研究新时期的书序，并加以论述总结，可能体会更加深刻，对改变自己的文风也可能有帮助。

再次，应进一步扩大与海外研究者的交流，取长补短。福建师范大学近年与港、澳、台学术界交流频繁。台湾当代散文家的写作，其记叙、描写的对象，写作的风格，对散文美学的追求，与大陆的散文家可能存在差异。两岸研究者对散文的研究也存在差异，例如台湾学者非常注重散文实用性的研究，重视对文本作细致深入的研究，都值得我们注意。两岸学者应加强交流，密切合作，在方法和路径方面互补。闽台区域散文文献整理与研究，是可开垦的学术领域，可以撰写《闽台散文源流史》。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年至今，招收海外博士生二十多人，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学生，尤其是台湾学生来大陆研究中国散文。

福建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是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是具有二十年历史的省级重点学科，研究力量比较雄厚，散文研究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我们注重将古代散文研究与现当代散文研究打通，目前，已经有系列研究成果面世，今后要做的工作还有许多。去年，我们组建了福建师范大学中国散文研究中心（陈庆元任主任，欧明俊、吕若涵任副主任），搭建了很好的学术研究平台。我们志在将古今中外打通，以宏阔的视野研究散文，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融通互补。我们有一支结构合理的散文研究队伍，希望经过努力，将本中心建设成为国家级研究中心。现在，我们将“2010武夷山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结集，交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为本次会议留一点痕迹。我们将论文集的总书名定为《中国散文研究》，想借此书的出版，激发本中心同仁对中国散文的研究热情，在出版第一辑之后，再出版第二、第三辑……本辑是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专辑，将来我们还要出版现当代散文或通代散文研究的专辑，希望得到海内外同仁以及正在攻读学位的学子们的支持和帮助。

陈庆元

2011年9月15日

写于闽江南岸

目 录

前言	(1)
十年来先秦散文研究巡礼	谭家健(1)
古代散文史的撰述立场与研究方法	阮 忠(8)
古代散文界说之总检讨	欧明俊(16)
以“精神”作为根本,推进散文理论建设	李正西(33)
试论先秦散文与诗歌文体兼容的“原型”形态	杨景龙(42)
论先秦诸子经解体	侯文华(54)
论殷墟甲骨刻辞“王占曰”之文的文体特征	梅 军(61)
春秋散文体类概说	
——以事务文类为例	邵炳军(71)
《左传》艺术风格探奥	姚曼波(77)
《晏子春秋》在先秦散文中的独特地位	刘文斌(86)
《春秋事语》史论之言简论	龙建春(91)
从“有说乎”审读战国“说”体之特征	
——兼谈宋玉赋于战国说体向赋体转变过程中之地位	柯镇昌(96)
《中庸》释义	许 总(103)
《庄子》和汉抒情赋的“士不遇”主题	周威兵(112)
论汉初庄学接受的类型与特点	高树海(120)
汉代奏议的进谏艺术	王启才(125)
汉代的罪己诏	郝文倩(133)
“朕甚悯焉”与“戴盆何以望天”	
——《史记》成书的哲学启示	邹然 蔡欣(143)
司马迁对人性恶的揭露与批判三题议	张克锋(150)
《史记》“西楚”的地理空间及文化分区意义	徐 华(157)
《史记·匈奴列传》的历史书写初探	田 蔚(163)
刘向《列女传》女性类型的认知特征	王利锁(169)

骨鲠与风骨

- 建安散文风格论 张连科(174)
- 六朝地记的兴盛、影响及其评价 王琳(181)
- 论汉魏六朝碑文的功能拓展和形式新变 钟涛(190)
- 《桃花源记》对后世记体文的影响 陶原珂(199)
- 论陶渊明散文的人格美、人情美、人性美 张虎昇(206)
- 《恨赋》、《别赋》四题 郭国平(214)
- “选论”初探 叶枫宇(222)
- 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奏议文体论 孟庆阳(231)
- 论唐宋文之争 马茂军(238)
- 中唐古文运动与“攘夷”无涉 唐晓敏(246)
- 高屋建瓴 大义微言
- 韩愈《送董邵南序》发微 张家壮(250)
- 论宋人对韩愈“文以明道”的接受 查金萍(254)
- 国内所见和刻唐宋八大家选本叙录 付琼(262)
- 宋代理学视域中的韩愈道统
- 以《原道》为中心的考察 张文利(272)
- 制从长庆辞高古
- 兼论元、白与古文运动之关系 吴怀东(279)
- 论李商隐文章的“骈中运散”与晚唐文章的发展 莫山洪(288)
- 孙樵与晚唐古文的发展困境 刘曙初(297)
- 横行四海,高步出群
- 韩熙载《江北行止》析论 刘心(306)
- 晚唐至北宋时期古文发展中“韩、李”并称的文化意蕴 李伟(313)
- 语录体与宋代诗学 马自力(323)
- 宋代制文的文体特征和文学性 赵维江 徐海容(330)
- 欧阳修记类文中以《易》立意举隅 李瑞卿(338)
- 试析宋代散文对《春秋》义法的吸纳
- 以尹洙、欧阳修为例 李建军(345)
- 宋代散文与小说关系论略 凌郁之(357)
- 北宋碑记文的发展
- 以欧、苏为讨论中心 王基伦(363)
- 北宋文坛对“元和、长庆风格”之接受及其意义 陈元锋(372)
- 《岳阳楼记》的政治文化背景 李强(381)
- 欧阳修史学的宋代评价 洪本健(388)
- 欧阳修“人情说”与平易文风 刘德清(400)

浅谈欧阳修文论的兼容性	袁晓薇(406)
欧阳修的六一风神与为政风流	裘新江(411)
欧阳修《与高司谏书》发覆	胡 旭(416)
论苏轼史论散文的文化价值	关四平(425)
关于苏轼的两篇佚文	
——兼论《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对苏文研究的价值	江 枰(432)
正名·谏诤·德音	
——苏轼《石钟山记》之山岳巡礼与困境隐喻	许东海(437)
行云流水	
——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的散文与书法艺术	衣若芬(450)
黄庭坚散文创作方法论	徐建平(459)
叶梦得与福州	潘殊闲(467)
李弥逊在闽宦迹略考	
——以《筠溪集》中之散文为考察中心	李 弢(476)
论刘子翥对孔孟民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杨国学(483)
读《渭南文集》表笺文札记	朱迎平(489)
《观澜文集》及其对唐宋派形成的影响	杜海军(495)
浅论周必大散文“雄深博雅”的主体风格特征	郭玉杰 李精耕(502)
试论骈文对宋代慢词的沾溉	郑虹霓(505)
金朝“借才异代”期的散文创作	王 永(510)
金元碑志体散文的文化价值考察	
——以道教人事为中心	蒋振华(517)
元代文章家姚燧的人品与文品	查洪德(524)
明代学记文的集体形态及其超稳定性特征	张德建(539)
八股文名目论考	
——关于“时文”、“前场”与“入口气”	马琳萍(549)
《蒋务本先生墓志铭》的文学史料价值	何宗美(555)
罗念庵文章观初论	陈 斌(559)
论王士性散文的时空形态	何方形(566)
九仙山麓数片石 绿玉斋中万卷书	
——徐燧《绿玉斋记》略论	于莉莉(572)
徐焘《荔奴述》与林古度《荔奴传》	陈庆元(577)
法与神:唐宋派古文理论的两个重要范畴	刘尊举(584)
屠隆《婆罗馆清言》禅之观照简论	张 宏(591)
袁宗道的小品艺术特征论析	邢 满(595)
汤显祖的散文理论与创作	邹自振(601)

开中西合璧的寓言创作之路 ——谈李世熊的《物感》·····	陈蒲清(609)
清初时文与古文的关系·····	张则桐(611)
清代初前期文人对欧阳修古文的评价 ——从艾南英到方苞·····	欧阳明亮(618)
气与道俱 斯文斐然 ——简论林雨化先生的古文观及其创作成就·····	林 怡(624)
学术与文学的共生 ——论仪征派“文言说”的推阐与实践·····	曹 虹(634)
汉宋调和的学术背景对嘉道时期桐城派发展的影响·····	张 维(643)
论《粤西文载》祠庙碑文·····	何婵娟(648)
汪琬《灌园图记》之伦理意涵·····	毛文芳(655)
《金农行书尺牍册》考释·····	方盛良(663)
瞿鸿机散文论略兼及古代某些散文文体的传承问题·····	谌东飏(669)
媒体文化与中国近代散文的新变·····	谢飘云(675)
王国维“六代之骈语”析论·····	吕双伟(682)
从《古文辞通义·总术篇》看前人治古文之学的方法和主要见解·····	熊礼汇(690)
集句文初论·····	张明华(697)
《自由谈》拟体谐趣文与古代散文文体对照研究·····	杜新艳(704)
古代散文研究的当代传播境遇·····	阙文文(712)
金门古代散文文献整理与研究 ——以金门碑刻为例·····	叶钧培(718)
近十年古文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研究概况·····	曾维龙(728)
古代散文研究的新成果 ——推介《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二十四讲》·····	刘 衍(736)
《北京赋》序·····	赵维江(739)
武夷山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洪本健 于莉莉(741)
编后记·····	(746)

十年来先秦散文研究巡礼

谭家健

近十年来,关于先秦散文综合研究的专著有六部,其共同特点是:试图突破作家作品论的框架,采用新的角度、新的理论思维、新的分析方法,对先秦散文从整体上重新审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某些问题和弊端。下面按出版时序分别评介如次。

杨树增《先秦诸子散文——诗化的哲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26万字,分上下编。上编本体论,七章,论述六经之后先秦诸子体现出的散文新流向,先秦诸子扎根于大变革时代的土壤,沐浴着理性精神的光芒,诸子流派纷呈,殊途同归,体现出哲学与艺术的高度结合,其体制经历了由语录体向专论体发展与成熟的过程。诸子散文是历史的也是未来的精神宝库。下编流变论,六章,论述:经世化民的箴言:儒家散文;满腔兼爱利天下:墨家散文;曼衍诗情抒追求:道家散文;敷张扬厉的辞令:纵横家散文;胸怀万方巧运筹:兵家散文;热血铸就治国策:法家散文。

本书首先从总体上概括出先秦诸子散文七个要点,然后对先秦六家分别进行评说。上编的设置,属于宏观性质,多有创获。所论各点,既概括了他人研究成果,又融入自己的体会,立论公允,评述得体,有的裁断较为准确、稳妥,令人首肯。下编的分论,属于微观性质,但不同于作家作品论,对每家散文作综合评析,大致符合实际,不乏精辟之处。不过,这方面的工作,他人多有尝试,而具体分析,大多未能超越前人。

此书在结构上的不足之处是,未能突出重点。上编七题,重点应在哲理与艺术的结合,这正是本书的副题,似乎尚未充分展开。下编论六家,重点应该是儒道两家,似可多用笔墨。

有的评论者认为,此书似乎对先秦诸子提出新颖的认识,尝试新的把握方式,但从具体论列看,实在是“换汤不换药”。这样讲未免要求过严。

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东方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24万字,共七章。第一章绪论,叙事学的背景与意义、对象与方法;第二章,先秦叙事的工具:结绳、刻契、图画、文字,认为汉字的构成已包括叙事的内容;第三章,论甲骨问事,青铜器铭事;第四章,论《易经》隐事,谣言记事,《诗经》感事,着重分析《诗经》消费形态,《诗经》之史诗,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诗经》对叙事学的贡献与影响;第五章,论《山海经》的静态叙事与神话思维,《尚书》的记言与论事,《春秋》的记言与立法,《左传》之史已有诗衣,其记言与记事均衡结合,文本与故事均衡对称,事实与虚构交融互渗,叙事主体的活跃与编年史体的桎梏;第六章,诸子言事的繁荣,着重分析其语言艺术攀登高峰,寓言故事蔚为大观,民间文艺登堂入室;第七章,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

对于傅氏此书,董乃斌在序言中给予高度评价。一,迄今为止大多数叙事学论著都以小说为主要对象,而傅氏则将一切“有秩序的叙述”的行为均视为叙事。其论述对象突破了文学的范畴,雅俗一体,史稗无分,韵散同举,三环(文学的产生、传播、消费)连锁,这就不但大大扩展了视野和取证范围,而且有利于对叙事行为作追根究底的研究。二,全书逻辑严谨地检视和叙述了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过程,从初民的叙事工具讲起,依次论析甲骨文、金文、《易经》、《诗经》、《山海经》、《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战国诸子散文中的寓言等在叙事学中的价值和各自特色,令人信服地得出中国叙事传统形成于先秦时期的结论。三,本书论析善于抓住各个对象的特点,紧扣叙事这个主题,而又不拘泥局促,在翔实资料的支持下,随处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论点,标志傅氏叙事学研究攀登上一段新阶,也预示他的研究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常森在《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中,首先肯定傅著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先秦散文研究方面最有探索意义的成果,对先秦叙事文做出了很多极具启发意义的解读。立论虽根于借鉴他山之石,但从先秦散文研究方面看,独到、深刻、细腻,对认识卜辞、铭文、史传、诸子的特点,对把握先秦散文、先秦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具有深远启示意义的观点和视角。常森同时指出,傅著的缺失非常鲜明。首先,其叙事学观念似乎还存在含糊不清的地方。例如,先秦诸子散文的主旨自然是在记言,但傅氏对叙事、记言关系的把握则有相当程度的混乱。其次,傅氏把握先秦散文的整体理念依旧是沿袭传统的看法,把文学视为史学或哲学的附庸,或者次一级、低一级的概念。其三,傅著在很多地方以叙事学之新鲜名头来转述或演绎传统的观念。其四,更重要的是,傅著的很多根本性论断缺乏实证,这极大地削弱了结论的科学性。著者不仅未对一些论断提供实证,而且根本无意于证明这种关系的确实性。

我认为,傅氏的《先秦叙事研究》,其基本理念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从国外引进的,运用于研究小说、史传文学乃至叙事诗是可行的,在微观分析方面取得一定成绩;然而,傅氏把它扩大到几乎所有先秦文学领域,显然凿柄难合。其最突出的毛病在于把记言与叙事混同,把诸子散文全部当叙事文学来看待,难免给人以牵强附会之感。叙事学有四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过程。准此,诸子散文中,除少量寓言故事之外,是不能算叙事文的。《尚书》的文章,除《金縢》、《顾命》等少数几篇外,也是不能算叙事文的,这是学界的共识。傅氏把荀子《成相》篇当成叙事文,还说“荀况的叙事学贡献是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说《山海经》的神话思维模式普遍地影响了后世叙事文学的叙事思维,说《山海经》对神怪外部特征的重视,移到文学上就是注重对人物外形的撮要描摹。此类论断经不起实证检验,难以令人信服。傅氏将一切“有秩序的记述行为”均视为叙事,不管是否具备叙事四要素,也不分是叙事还是说理、抒情、写景,这样无所不包的叙事学,实际上已成写作学的代名词。

饶龙隼《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2 年出版,40 万字。全书分导言、上编、中编、下编。导言从人群变动和学术演变两条主线,考述先秦诸子的产生及进程;上编考述先秦诸子的文学创制活动,包括讴歌啸咏、创制篇什和设为寓言等方面,以显示中国早期文学的创造精神、演述体制、文辞体式、传写形制和用象形式;中编考述先秦诸子的前文学批评活动,包括诸子《诗》说,诸子神怪论和诸子“小说”观等,以展示古代文学观的前状态,即实用精神、神怪思想和学术变态;下编考述先秦诸子的用象制度及形态,包括观念具象的演

变历程、基本特征和语言形式等内容,以探寻诸子时代的具象思维状态和言意操控能力。

此书给人突出印象是强烈的全面创新意识。其研究角度、思维方式、基本理念和使用概念、范畴,皆与众不同。最新之处是“把文学视为一种制度和一种制度下的活动”,文学作品乃“此制度与活动的产物”,以此观念统摄全书。

黄霖的《评饶龙隼〈上古文学制度述考〉》(《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说“将制度引进到文学领域之中,无疑熔铸着一种创新精神”。这是“饶先生在长期研究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从中国文学的通变实况中抽绎出来的,因而是具有充足的理据和独特的识见”。“作者翻遍了考古发现,原始宗教,神话传说,民族遗存,殷墟甲骨,殷周金文和群经诸子及其传释疏证,并注意吸取近代研究成果,辨析决疑,故所得结论令人信服”。这些评价也适用于饶氏的《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

然而,据我所见所闻,有些读者对饶氏之基本理念表示怀疑,认为所谓“文学制度”这一术语难以接受。饶氏把“文学制度”的内涵,定义为包括创制精神、文学体制、传写形制、意象制度、言说形式、前文学观念等等。我认为,所谓“文学”,在先秦之含义并不明确,何谓“文学”、何谓“非文学”不容易划分。所谓“制度”,《现代汉语词典》定义为“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我的理解,是由社会上层统治者制定而被社会普遍遵守的带有刚性的规则。在先秦,有宗法制、赋役制、礼制、乐制、兵制、官制……而未闻有文学制度之说,先秦有语法而未必有语言制度,有音韵而未必有用韵制度,有各种文体而未必有文体制度……。至于观念、精神,很难加以制度化。饶著所谓“文学制度”内涵,多数可以理解为社会习惯、不成文的规则或潜规则,集体意识或无意识的意识,是人们约定俗成,习以为常,不自觉地形成的,而非自上而下颁布推行的,语言、歌谣即是如此。以文体而论,格律诗、词牌、曲谱、应用公文、八股文,才是制度化的产物。而在先秦时代,不论《诗经》体、楚辞体、史传体、诸子百家文体,尚无根据说它们是什么人制定的。后人可以从先秦文学活动中总结出某些规律,从复杂的个别现象中抽绎出其共同性,可以而且应当运用现代概念、术语加以概括。但是,这种概括应该有充分事实根据和学理依据,应是准确得当、严肃而慎重的,否则难以成立。

饶先生明确地对学界提出挑战。他说:“我引入文学制度观念,是对上古文学研究的实验。这样的学术实验是有挑战性的。不仅要面对上古文学自身规定性的壁垒,还要反思批判近世中国文学研究的利弊。因其壁垒,所以就要抱定攻坚必破的决心,切实考述上古文学制度的基本内涵。因其利弊,所以就要秉持精诚公允的态度,零点评估近世文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切实考述和零点评估,这就是我的学术旨趣。”(饶龙隼《上古文学制度述考》,第17页)竟把近世文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评估为零,这种口气令人惊讶。

饶著使用了大量新的术语,用得最多的是“具象”。作者声明不赞成用“形象”、“意象”、“兴象”、“象征”。他特别提出“具象”一词,其中又分为“原型具象”、“介质具象”、“观念具象”、“叙事性具象”、“感兴具象”、“复合型观念具象组合”、“单元型观念具象组合”等等。实在不好理解,难免故弄玄虚之嫌。有时甚至舍平易而用艰深,例如把从神灵发展为神怪,称为“神怪逸出”,读者很可能以为是神怪从什么地方逃逸而出。还有“隐开”、“冥一”、“向度”、“气感取象”等等,均属生造词语,不知其确切含义是什么。

书中有些具体分析论断与原文大相径庭。第111页说:“墨子又是厌弃书籍的始作俑

者。”他所根据的《墨子·贵义》篇原文是：“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车厢)载书甚多。弦高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治)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均，是以书多也。今若(公尚)过之心者，数逆于精微，同归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书也，而子何怪焉？”墨子明确地肯定自己不废书，学习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因而出门载书甚多。至于不要求公尚过多读书，是因为他对事理通达精微，天下殊途同归之物，已知其要领，就不教他多读书了。显然，这是因材施教的个案，不能得出墨子废弃书籍的结论。第112页说：“孟子崇尚古乐，反对新乐(即俗乐、新声)。”根据是《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说，这没有关系，“今之乐由古之乐也”。杨伯峻《孟子译注》译为：“无论现在流行的音乐，或者古代音乐都是一样的。”又《孟子·尽心下》记，高子对孟子说：禹之音乐高于文王之音乐。你看禹的钟纽使用得都快断了。孟子认为，那是使用的时间长造成的，不是高低之别。可见孟子并不认为音乐越古越好。作者说：“孟子对当代讴歌啸咏不感兴趣，对其中蕴涵的审美情趣亦缺乏体认。”此论不确。《孟子·离离上》引用沧浪之歌并对含义大加发挥，怎么能说孟子对讴歌不感兴趣呢？

程水金《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寻》，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49万字。第二卷，2004年7月出版，53万字。此书分为三编：第一编，巫卜文化与巫卜散文，分三章论述甲骨卜辞、《周易》筮辞；第二编，史官文化与史官散文，分八章论述殷周铜器铭文、《尚书》、《逸周书》、《国语》、《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等书；第三编，士人文化与士人散文，分四章论述老子、孔子、墨子。按照作者计划，还将有第三卷、第四卷，分别论述先秦其他诸子著作。

本书力求考证辩驳与理论阐述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所论古籍，先大量收集整理前贤有关资料，加以比较，剖析折中，取长补短，而后铸成己意，可谓剔抉入微，新见迭出。宏观概括，亦不乏精彩的卓识。有不少篇幅似乎是文字和概念考释，实质上是探求其历史根源和文化内涵。作者知识面比较广博，思维相当细密，在近年来同类著作中不可多得。例如：把《尚书》的主旨概括为搜缀既往，寻觅古鉴，《逸周书》体现出从援例鉴古到历史经验的条理化(此说极精到，实发他人所未发)。《春秋》及三传目的在反思历史探求公理。遵循时间——因果律，显现出理性精神。老子是由史官而退为隐者，其文化特征打上双重烙印。对老子的“道”与孔子的“道”作出细密的比较。以专章考论孝、礼、仁三个范畴，构成儒家君子的人格与圣贤气象。又指出学、思、孝三者是《论语》的文化内涵，从个性、情感、理趣分析孔子的人间情怀和《论语》的文体风格。对墨子的十大主张也分别作具体的评论。

最令人欣赏的是关于老子与孔子的比较。第二卷243页说：“为了消除日趋紧张的人文对峙，摆脱历史困境，老子设计了两套相辅相成的方案，一是尽量削减人伦规范以至于放弃一切人文举措，采取无为无事的施政方略；一是杜绝人的一切私欲，彻底消除人文对峙的总根源。”479页说：“孔子同样感受到社会危机与道德堕落，但与老子相反，孔子认为，削减人伦规范以至于放弃人伦举措，并不是解决社会危机，消除人文困境的有效方法。恰恰相反，重整既有的人伦规范，改良既往人文传统，则是匡济现实人心，整顿社会秩序的救世良方。因此，孔子并不像老子那样，具有深沉博大的宇宙情怀，也没有老子那样整体的历史批评观

念。其思想发生过程,是由当下社会政治秩序的批判,进而重建理想的道德价值体系。”此类宏论,书中随处可见。

此书也有明显不足。第一,还不是真正的散文研究,而是以思想文化研究为主体,关于文体特征、修辞技巧、写作经验乃至语言艺术等等,语焉而不详,没有下太大气力。正标题是符合书的实际的,副标题则未充分体现出来。第二,此书多有卓论,但仅是“点”,而未构成“面”和“线”,对所论每本书或每位思想家,未作全面评析,只是抽取几个问题来讲。各章之间看不出有机联系。此书属于散论、丛论,而不是“史论”,更不是“史”。第三,作者或许过于求新立异,立论有时过于勇敢而欠周密,难免有片面性。墨子一章尤其明显。如说:“墨子的目标,是要将旧贵族统统赶下台,颇有阿 Q 革这伙妈妈的命的意味。”(第二卷 541 页)“墨子的尚贤、尚同的主张,虽然并没有明倡暴力革命,而实质上即蕴涵着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意识。”(第二卷 543 页)“毫无疑问,墨子要在社会底层选拔一班农与工肆之人,使之成为新的贵族,以取代旧的贵族,并将旧的贵族废为奴隶。”(第二卷 542 页)这是没有根据的抬高。另外有些地方又评价过低。第二卷 639 页说:“从总体上看,墨子的道德观与伦理观,表现出‘有用即真理’的功利主义色彩,其方法论也体现出‘感觉即实在’的经验主义倾向。”把“有用即真理”、“感觉即实在”这些西方哲学帽子扣在墨子头上很不适当。第二卷 565 页说:墨子“这种爱,类似于商业行为中的等价变换。因此,墨子之所谓兼爱,实质上就是互利”。认为“郭沫若说墨子并不重在爱人,而是重在利己,虽然偏激,也不无道理”。作者似乎忽视了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以及后期墨家讲的“杀己以存天下”,“爱人非为誉也”,墨家之徒为了实践“义”,具有“赴汤蹈火,死不还踵”的牺牲精神,怎么能说墨子“重在利己”呢?

从引证和讨论的对象看,此书重视古人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见解,很少提到近三十年的著作。由于作者未能充分吸收最新成果,对于某些已经进一步深化了的问题,其分析评论似乎显得滞后。

张群《诸子时代与诸子文学》,齐鲁书社 2008 年 12 月出版,22 万字。第一章,从诗到思,文化视野里的诸子散文。第一节,论诗人时代与中国早期文化的诗性特征;第二节,理性文化的勃兴与散文时代的到来,认为早期主要是史官文化,而后发展为士人文化,由哲学的独立发展为哲理散文的独立;第三节,论诸子散文的文体演进;第四节,论诗性文化在诸子散文的文体演进;第五节,论诗性文化在诸子散文中的余响,认为《老子》是诗化的哲理散文,《论语》是诗意言说,《庄子》反映一位哲学家的诗意人生。第二章,文学与象征,诸子文学的艺术表现。第一节,论“文”的观念的出现和“文言”的诞生;第二节,论“立象以尽意”的意象思维;第三节,论象征与诸子文学中的意象,着重分析“比德”说与玉、山、水、松柏等意象。第三章,骋辞驰说的诸子说理散文。第一节,论诸子说理艺术,着重分析归谬法和比喻、寓言的运用;第二节,诸子对说理文的开创之功。第四章,诸子寓言。第一节,诸子寓言的产生及意象思维特征;第二节,诸子寓言的发展历程;第三节,论庄子的泛寓言。第五章,诸子时代的文艺思想。第一节,诸子的“文学”观;第二节,儒墨文艺思想之比较;第三节,以大为美的抽象美学观念萌芽于诸子时代。第六章,儒道诸子与中国文学。第一节,孟子与中国文学;第二节,老庄对古代文论的影响与贡献;第三节,儒道互补与中国古代文人的哲学;第四节,先秦诸子与古代文体,着重论述连珠体和荀子的诗体与赋体。

本书立足于诸子所处时代的政治状况和哲学思想的发展,揭示文化发展对文学的影响,结合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分析,描述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的诸子文学的原生状态,探索时代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力图从文化论文学,重点还是处处紧扣文学,没有离开文学专门另论文化。思想清楚,概念明确,立论平实,不刻意求新,梳理前人而后出以己意,态度认真而诚实。第一、二、三章比较好,第四、五、六章稍嫌平淡,有些观点是别人讲过的,超越不多。全书的“文化”观,主要是史学与哲学,而对宗教、艺术、民俗等注意不够。关于寓言的论述,前后有些重复甚至夹缠,有时把寓言和比喻、引证以及真实的历史故事等混合在一起(饶龙隼的书也有这种现象),给人以寓言的范畴过泛之感。

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45万字,共八章。第一章,论商周巫卜文献:甲骨卜辞,图象文献和易占卦爻辞,象征与阐释;第二章,论西周礼教文献:铭文与盟诅辞,神道设教与周初八诰,仪式追溯和典谟制度及《尚书》文章;第三章,论春秋史传文献:《春秋》书法、《左传》叙事逻辑、虚饰与实录;第四章,论春秋时代之“语”类文献:春秋君子文化,《国语》与君子立言、《老子》与箴诫之“语”、《论语》语录体的意义;第五、六、七章,论战国诸子文献:《礼记》与儒学传承方式、《墨子》之论辩、《孟子》与师道传承、《庄子》与优语、《荀子》的文章体制和文学观念、《韩非子》的文体、参验法和辩难术、《说林》和《储说》;第八章,战国策士文献:分析《战国策》的语言方式及寓言。

本书从文化发展的大视角出发,对先秦散文文献作文体探源、文体功能及文体演变的研究。作者认为,所谓文体,即文本的形式和表达方式,主要受到话语权力所赖以生成的文化形态的影响,至于文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倒在其次。本书的基本观点是:先秦时期正是文化、政治、官制、社会习俗等急剧变化发展的时期,不同文化层面的信仰、传播、组织方式,不同社会阶层的职事、行为方式等,都对文献本身产生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但甲骨卜辞、易卦爻辞、史传文献、诸子散文、纵横家说辞,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和文化功用,而且,每一类文献内部的不同种类文本,如《尚书》中典、谟、誓、诰、训、命等,史传散文中的经和传、记事体和记言体、《周易》中的卦爻辞和大传、系辞等,都有不同的文化意义,其文体形态受文化功能的制约。

本书在以下几方面有重大突破:一,在宗教文化向理性化过渡的大背景下,通过对不同层次文化的社会功能、表达方式、实现途径等作细致深入的研究,揭示它和各类文献之间的深层关系;二,对文献创制者的职事、言说范围及言说方式进行详密的考察;三,进一步探索不同文体的功能,并对其文化地位及对后世文学观念的影响做出判断;四,描述各种主要散文文体的形式特征、文章原义和相互间的继承及影响关系。

本书的基本理念范畴和论述方式既不是从国外引进的,也不是重复中国的旧有传统,而是把近三十年来文化研究的观点方法与古代文化活动有机结合,充分尊重并努力吸收近三十年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在注释中作出详细交待,即使片言只语也不含糊,这种认真精神十分可贵。本书的许多结论,既新颖独创,又能令人理解,乐于接受,不少地方,精彩透彻,妙语迭出,使人击节赞赏。立论有相当理论深度,但并不玄奥,较好地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全书结构有序,要言不烦,重点突出,论析充分,较少繁词浮论。在近十年的同类著作中堪称特出。

本书不足之处是:各章之间有些夹缠,有的话前面讲过后面又重复,有些例证循环使用。

本书不再分论思想性、艺术性是可以的,但对各种文献之不同思想价值,不同美学效果和不同修辞风格个性,比论不够。本书的主旨实际上是先秦文献文化演进之研究。既然用“先秦散文研究”为题,应在文学研究方面有所加强,文化研究并不能代替或完全涵盖文学研究。

综观十年来先秦散文研究的几部专著,不难发现其共同追求是,把文化研究引入文学研究,这与近三十年来大的学术趋势有关。比起三十年前以政治论文学是一个进步,比90年代前期着重于写作艺术和文本研究,也有所深化。但是,所谓文化研究的范围尚不确定,先秦时期文史哲不分,几乎所有先秦古籍都具有文化价值,先秦散文著作如何找准自己的位置?从文化史角度阐发,怎样与思想史、哲学史、史学史相区别?都值得探讨。我以为,既然称之为先秦散文,应该属于文学范畴,应当以文学性为主,分析其形象思维、艺术手法、修辞技巧等等,从中发掘出美学内涵。文学史家不是去占领哲学史研究、史学史研究的地盘,而是要深耕细耘自己的园圃。可惜,从清代起,重考据,轻义理,鄙薄辞章之学的风气,沿袭至今。今天,我们在积极开拓文化研究的同时,如何推动先秦散文的研究回归到文学的本题上来,似乎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古代散文史的撰述立场与研究方法

阮 忠

古代散文史的撰述,需要站在怎样的立场才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性?本来不可还原的散文历史,怎样撰述才能最大限度地贴近它的历史?王齐洲先生曾谈到文学史的编写,自问当用文学的方法还是历史的方法。文学的方法是审美的,可以细致地分析作品、介入感情;史学的方法则是实证,让史实说话,少作主观的判断。对这二者,他作了一些阐述后,最后结论道:“在文学形式和文体发展的描述中,应该尽量采用历史的方法,而在文学内容和作家作品的分析中,应该注意采用文学的方法。”^①我无意探究这种折中的意见在文学史或散文史撰述上的史学和文学分寸的把握,而提出古代散文史撰述者的三种立场,以期引起关注。

其一,撰述者的实录立场。

班固继司马迁之后撰述西汉历史,故有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这种断代史的开创性和司马迁通代史的开创性,都是时代影响所致。司马迁之前无通代史,司马迁之后西汉无史,二史问世,从此纪传体的通史与断代史成为史家的楷模。班固在《汉书》中为司马迁立传,说司马迁的《史记》为“实录”,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关键是他不为尊者讳,也不为贤者隐。同时,《史记》并非不渗透或说不表明司马迁的社会评价,他把自己的社会评价寄寓在客观的记叙中。同时采用简洁明快的“太史公曰”把直接的评价独立于历史的记述或描述之外,避免影响记述的客观性。班固及其后的史家多沿袭司马迁的这一历史记述方法,使述与评各自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

古代散文史与《史记》同有“史”的性质,散文史的写作是否应该遵循《史记》的“实录”原则,如实录,散文史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形态?袁行霈先生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文学史·总绪论》里说:“文学史属于史学范畴,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随即指明这包括了三点:史的脉络、描述式的语言方法和史的规律,并涉及到文学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文学史史料学研究。这一文学史的撰述思想无疑可以移用于中国散文史的撰写。然而,这里理论的表述比散文史写作的实践要容易得多。怎么贯穿史的脉络,怎么运用描述式的语言以及怎么提炼出史的规律,以及怎样体现“实录”的原则,都是相当艰难的事情,散文史的撰述本身,是可以实现“实录”的吗?

当下的学界,只要对某一学问有专攻,有兴趣,有心为史,就可以成为某史的撰述者,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散文史亦然。所以眼下的文学史家、散文史家比比皆是。然而在古人

^① 王齐洲《中国文学史简明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0页。